

## 初唐边政与边塞诗主调的流变<sup>①</sup>

陈友冰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分析初唐时期唐王朝与突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少数族政权之间的臣服、抗击、征战、羁縻等边政主调的变化过程,可以揭示出初唐边政的总体思路和付诸实施的具体举措;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探究初唐边塞诗与初唐边政之间的某种关联,以及由这种关联所形成的边塞诗主调的某种变化及其特色。

**【关键词】**初唐; 边政; 边塞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11)04-0035-12

公元618年,经过了二十多年隋末战乱的中华大地又崛起一个新的王朝——唐王朝。从这个时候起到睿宗先天元年(712)的百年间,初唐统治者的主要精力是对付突厥、吐蕃、吐谷浑和党项等西北少数族政权,其边政是或防御、或征讨、或和亲、或羁縻,其结果不仅使这些地域正式纳入唐帝国的版图,也使这些少数族在文化、心理上渐渐融入汉民族之中。当然,这种变化也不仅发生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它也使初唐时代的民族精神和社会风气产生巨大的变化和特定的导向,这种变化随即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作为唐代文学的代表——诗歌尤其是边塞诗,首先得风气之先。

### 一

中国的边患,历代都有,而以唐代为甚,问题也较复杂。唐代以前,中国的边患多在北方和东北。到了唐代,除了北方的突厥、东北的奚、契丹外,尚有西北的西突厥、回纥,西方的吐蕃、高昌、吐谷浑、党项、焉耆、于阗、疏勒、龟兹,以及西南方的南诏等。初唐时代主要的边患是北方的突厥,西方的西突厥、吐谷浑和吐蕃。其中威胁最大、交战时间最长的是突厥。当时,突厥地缘广阔、兵力强盛,“东自契丹、室夷,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甚至中原民众为逃避隋末战乱,也“奔之者众”<sup>[1]3471</sup>。唐与突厥之间的和战变化、攻守易位,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 笼络忍让期

李渊父子借兵突厥,灭隋兴唐,时间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至唐高祖武德二年(619)。

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在太原起兵建立唐朝。在此之前,高祖和太宗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和部署,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遣使至突厥,向突厥称臣。关于称臣突厥,史书对此语焉不详,只是《旧唐书·李靖传》中,唐太宗在平定突厥后,曾回顾与突厥交往时谈到这段不光彩历史时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sup>[2]3774</sup>《新唐书》、《通鉴》亦有同样的记录。反映唐起兵至立国这段时间史事的重要著作《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在提及与突厥始毕可汗之书的封题上,高祖坚持用“启”而不用“书”,也侧面印证了这一关系。至于向突厥称臣的原因倒不是国力孱弱、无力抗衡,而是为了向突厥借兵来灭隋兴唐。作此建议的乃是李渊在太原时的主要谋士刘文静,这在《旧唐书》卷五十一《刘文静传》中有明确的记载:

(文静)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而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始毕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文静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大喜,即遣将康鞘利领骑二千,随文

① [收稿日期] 2011-02-21

[作者简介] 陈友冰(1944—),男,安徽肥东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大学研究生导师。

静而至,又献马千匹。高祖大悦,谓文静曰:  
“非公善辞,何以至此?”<sup>[2]3750</sup>

借兵伐隋和事成后的利益分配说的清楚明白。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便是刘文静与前来平叛的隋将桑显和大战于潼关,“文静度显和军稍怠,潜遣奇兵掩其后,显和大败”。潼关一旦洞开,东都洛阳即无险可守。这关键一战中的“掩其后”的“奇兵”,就是康鞘利的二千骑兵。接着,这二千突厥精骑又“遂下韩城”,大破桑显和的主帅屈突通,尔后又参与唐削平群雄的统一战争,数年奔波“从平京师”。处罗可汗时,也曾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配合唐军,击败刘武周。突厥骑兵善长骑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唐得突厥精骑之助,作战能力实不止增长数倍。在唐平定割据势力的统一战争中,多以骑兵冲击扭转战局,突厥骑兵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资治通鉴》记载,始毕可汗许诺的并不止这两千精骑,而是“发兵送李渊入关,多少随所欲”,那作用就应当更大。至于始毕可汗赠予的“战马千匹”也不可小视。隋末之际,中原马匹匮乏,而且羸弱,太原起兵前夕,“士众已集,所乏胡马,待之如渴”<sup>[3]391</sup>,裴寂、刘文静等起兵骨干甚至认为胡马比胡兵更重要,他们在劝李渊答应始毕可汗结盟条件时劝道“今义兵虽集而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需,而马不可失。”<sup>[4]卷947</sup>康鞘利以马千匹交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唐军马匹缺乏的困难,对李唐军队战斗力增强起了促进作用。

李渊做出了与突厥相结,乃至称臣于突厥的政治决策,是由于当时自身条件和历史社会背景作出的不得已的抉择。从自身来说,李渊起兵太原,除了以代王杨侗为帝,兵员和马匹都极其匮乏。另外,李渊起兵前曾任太原留守,“北备边朔”,曾与突厥数次交锋,这一经历使他对突厥的军事威势有较深的了解,因此,他比其他割据势力更清楚地认识到欲取天下,必先与突厥媾和的迫切与重要。一旦与突厥结盟(哪怕是不平等的),不但可以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而且没有了后顾之忧,能够胆逐鹿中原。从历史背景和当时的政治态势来看,李渊也不是唯一对突厥采取笼络奉迎之策的地方势力。李渊之前的北齐、北周,慑于突厥的威势和不绝的骚扰,也都对突厥竭力笼络奉迎:北周与其和亲,“岁给缛彩絮锦,突厥来京又待以优礼,齐人亦倾库藏以给之”<sup>[5]2666</sup>。李渊时代的北方的割据势力,如白榆妄、王须拔、魏刀儿、

刘武周、郭子和、窦建德、薛举、李轨、高开道、梁师都、刘季贞、张长逊、王世充等,无一例外地卑辞厚币,臣事突厥,希冀以此法来免除突厥的侵扰,又冀以此获得突厥精骑之助<sup>[6]197</sup>。

不平等的结盟乃至称臣也必须付出代价,这就是屈辱和隐忍。唐初在与突厥的交往过程中,唐基本上是以臣待君之礼恭待突厥:突厥使至,必置酒宴,而且赏赐丰厚,唐对突厥使者颇“貌恭”、“敬畏”这类话语常常出现在这段历史记录中。如武德元年八月,遣郑元畴以女伎往突厥“赂始毕可汗”,始毕可汗遣使骨吐禄特勤至太原,唐“宴讌突厥使者,奏九部乐于庭,引骨吐禄升御座以宠之”<sup>[7]2000</sup>;突厥此时也以宗主国自居,“每遣使至,多横暴”,“言词悖傲,求请无厌”,唐朝政府对于突厥这种的骄傲和无理每每也只好隐忍以待,“每优容之”(卷194《突厥传》)<sup>[2]4095</sup>。武德二年,始毕可汗去世,其弟处罗立,郑元畴被扣,唐又遣汉阳公李壤出使又被扣。面对突厥背信又如此蛮横,李渊仍然采取屈辱和隐忍既定之策,“复遣使赂颉利,且许结婚,遂遣使送还”<sup>[8]卷一</sup>。西突厥曷萨那可汗在隋亡后投奔唐,始毕可汗闻讯后,遣使至长安,要杀曷萨那。为了不与突厥关系破裂,“存一人而失一国”,高祖不得已“纵北突厥以杀之”。唐与突厥之间这种臣属关系在始毕和处罗可汗时期一直维持着。《旧唐书·突厥传》载,始毕去世后,处罗可汗嗣位,遣使入朝告丧。“高祖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又遣内史舍人郑德挺往吊处罗,赠物三万段。次年,处罗可汗死,高祖为之罢朝一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可见在唐起兵之初至颉利可汗继位前,唐与突厥之间大体上维护着和睦相处的稳固的君臣关系,尽管其间夹杂着零星的军事冲突。

#### 第二阶段:冲突交战国

唐与突厥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直至唐灭突厥。时间从高祖武德二年(619)至太宗贞观三年(629)。

天下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友谊,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始毕可汗在位时期,对唐的政策是政治上支持,军事上赞助,除了部下与唐有两次零星冲突外,双方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继位的处罗可汗在位时间不足一年,这种格局变化不大。武德三年六月,颉利可汗继位。雄心勃勃的颉利可汗不愿看到南方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帝

国,便向与唐敌对的北方割据势力如刘黑闥、刘武周、苑君璋等提供兵力援助,制造唐王朝的对立面和建立唐与突厥之间的隔离带。如武德四年,与马邑苑君璋合兵攻雁门;五年春,遣数万骑与刘黑闥合军围攻唐将李大恩,致使“王师败绩,李大恩殁于阵,死者数千人”(卷194《突厥传》)<sup>[2]4095</sup>;当这些割据势力失败后,颉利又为他们提供政治庇护,资助他们卷土重来。如五年三月,李世民败刘黑闥于洛水之上,刘黑闥即亡奔突厥,且借突厥兵力,卷土重来,“六月引突厥寇山东,山东州县多为黑闥所守,所在杀长吏以应之”(卷1《高祖纪》)<sup>[2]3486</sup>。这当然是以统一中原为己任的李渊父子所无法容忍和面对的。于是唐与突厥矛盾进一步激化,突厥对唐的军事行动也一步步升级,呈现出次数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如武德四年四月,颉利“自率万骑攻雁门”;五年六月,“自率五万骑南侵至于汾州,又遣数千骑南侵西入灵、原等州……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卷194《突厥传》)<sup>[2]4095</sup>;同年八月“丙辰,颉利寇雁门;己未,进寇朔州”;六年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卷1《高祖纪》)<sup>[2]3486</sup>;武德七年,唐平定了除梁师都在外各割据势力,天下初定。颉利的侵略规模更甚,自武德七年至九年,突厥大规模侵边每年一次: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奉国入寇”;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万”内侵;九年七月,甚至攻至渭水北岸之便桥,逼近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冒险亲到渭水,与颉利订城下之盟,多输金帛,才化解危机(卷194《突厥传》)<sup>[2]4095</sup>。

在突厥族越来越激烈频繁的侵扰下,唐政府只得改变国策,边政主调由卑辞厚币、恭谦忍让转为积极备战:一是复置十二军。武德八年五月,高祖以天下大定,“将偃武德,遂罢十二军,大敷文德”<sup>[4]卷90</sup>。太宗面对如此形势决定复置十二军,并亲自操练,据《旧唐书·太宗纪》载,太宗“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并“亲自临试”,由于太宗的督促和劝导,以作表率,兵将均兢兢业业,“自是士卒皆为精锐”。这批精锐后来成为灭东突厥的主力。武德八年又在边防“豳州北界,东拒子午岭,西接临泾,修营障塞”,修筑城堡以作防御(卷58《刘弘基传》)<sup>[2]3753</sup>。武德九年正月,突厥声言入寇,唐政府又“束力州县修城堡,谨烽候”<sup>[4]卷90</sup>。在武力备

战的同时,唐王朝又采取历代中央政府采取的远交近攻策略,在东突厥内部以及与其它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制造矛盾,以削弱其力量。如武德八年,西突厥叶护遣使请婚于唐,高祖“权许其婚,以威北狄”,使东、西突厥彼此掣肘,尽管此事“遇颉利频岁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为婚”(卷199《突厥下》)<sup>[9]2835</sup>,但却使西突厥悦心助唐,牵制了颉利对唐军事进攻。其三,在突厥内部采取离间政策以抑其势。突厥社会本身充满各种矛盾,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大可汗颉利与别部可汗突利之间隔阂较深。突利是颉利之侄,管奚等数十部,受大可汗征调与管辖,但有一定独立性。唐太宗利用了二人的矛盾,使他们互相猜忌。武德七年八月,颉利、突利叔侄奉国入寇,在幽州与唐军对垒,太宗“行反间之计于突利,突利悦而归心焉。其叔侄内离,颉利因而遣使请和”(卷197《突厥上》)<sup>[9]2818</sup>。

武德末年至贞观初,唐和突厥的军事态势发生逆转,突厥由盛转衰,唐则由守转攻。突厥的衰落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客观上是遭遇了罕见的灾难性气候“天下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国力大大削弱。主观上则是颉利没有正确判断形势,仍然“重敛诸部”,准备南侵,结果造成内部怨声四起,分裂叛变。首先是突厥所属部落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相继叛离突厥汗国,与唐结盟。这些部落是突厥军队的主体,他们的叛变,不仅是突厥丧失了大部分精锐兵源,而且这些部族归唐后,由突厥属部变成敌国,在唐大举进攻时,成为威胁颉利的心腹之患。其次,由于“颉利纵欲逞暴,诛忠良”,突厥贵族矛盾加大,“突利、拓设、欲谷杀皆获罪”,乃至发生公开军事冲突。从唐朝国势来看,国内统一战争已经结束,政权已经稳固;军事上厉兵秣马,练兵教战,已取得明显成效。同时,社会生产恢复发展较快,整个国力有了明显的增长,灭亡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贞观三年八月,代州都督张公瑾上书请伐颉利,列举了六条理由,唐朝政府开始了对突厥的大举反击。当年冬,唐太宗命徐世勣、李靖、柴绍、李道宗、薛万均、卫孝节等率兵十余万分四路大举出击,次年在白道大败突厥军,其部众如突利、康苏密等纷纷来降。唐军乘胜追击,俘其众十余万,并生俘颉利可汗,东突厥遂亡(卷194《突厥传》)<sup>[2]4095</sup>。

### 第三阶段:征伐羁縻期

时间从贞观四年(630)至中宗景龙元年(707)。唐王朝此时采取两手:一方面趁机扩大战果,剿灭突厥残部,并征服西域和北疆其它不附诸国,如伊吾、西突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党项等,并将其并入版图。从战争性质来看,大都是少数族背盟,给唐王朝找到征伐的口实。如贞观四年,高昌国突然改变对唐的友善态度,勾结西突厥,阻断西域诸国向唐朝贡,并攻击归附唐的伊吾。太宗先是命降唐的薛延陀部击之,以夷制夷,再命侯君集率步骑数万征讨。贞观十五年,攻陷高昌,将其三州五县并入版图,于其地设西州,并设置安西都护府。高昌攻陷后,前来救援高昌的西突厥叶护可汗也随之降唐,唐王朝在所属之地设庭州(卷198《西戎·高昌传》<sup>[2]4113</sup>)。自贞观六年起,焉耆对唐时附时叛。贞观十八年,命安西都护府郭孝恪率兵讨焉耆,俘焉耆王,将其地并入版图,设焉耆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龟兹王苏伐叠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立,开始叛唐并侵略邻国。当年十二月,太宗以阿史那社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十万讨伐龟兹。贞观二十二年冬,大败龟兹,擒诃黎布失毕,将安西都护府由高昌移至龟兹,兼统于阗、疏勒、碎叶、焉耆四镇。西域震慑,诸国相继奉唐为宗主国(卷198《西戎·焉耆传》<sup>[2]4114</sup>)。高宗永徽二年(651),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趁唐国丧叛唐。高宗从永徽二年到显庆二年(657)六年间,三次伐西突厥。将西突厥自天山北路直至里海西北的广袤领土纳入版图,置濠池、昆陵二都护府(卷194《突厥传》<sup>[2]4099</sup>)。北边的吐谷浑在隋末与李渊结盟,反隋和共同歼灭西北割据势力李轨。高祖武德五年八月,吐谷浑背盟寇岷州。此时天下未定,又值突厥连续进犯,高祖只能对吐谷浑忍让和怀柔。贞观八年(634)吐谷浑再次背盟入侵凉州。此时双方攻守形势已经逆转,太宗有余裕的国力和军力来对付吐谷浑。于是命李靖、侯君集并已降的突厥、契苾等部分南北两路进击,大破之。吐谷浑王伏允亦在逃跑中为部下所杀(卷198《西戎·吐谷浑》<sup>[2]4113</sup>)。

西北少数族政权归附,特别是其领土并入唐朝版图后,唐王朝即承续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周边少数族政权采用的传统羁縻方略。所谓羁縻,是相对征伐而言,它是中国古代中央政权所采取的以安抚、怀柔为主要手段的统治方略,即通过封

官爵、赐尊号,认可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下嫁公主、输赐金帛、保留其制度、习俗等来换取对方对中央政权的遵从和依附,定期朝贡、朝贺并纳入中国版图。在中国古代史上,羁縻制度是维护国家统一,保障中央政权对周边有效统治,避免民族战争和社会动荡的一种有效手段。唐灭东突厥后,李世民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但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在众臣辩论中听从温彦博建议,在幽州至灵州设顺、化、祐、长四个羁縻都督府。又在东突厥颉利故地设定襄、云中二都督府,安置突厥降众,并分别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颉利为右卫大将军。西突厥灭亡后,在其故地置濠池、昆陵二都护府,任命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布真为濠池都护,继往绝可汗。至于原来西突厥所统理的多罗斯、及西域诸国,西至波斯,皆设羁縻州府,一起置于安西都护府治下。“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sup>[3]524</sup>。西北方的吐谷浑平定后,太宗封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贞观十三年,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入唐朝觐,太宗将宗女弘化公主嫁与为妻。此后吐谷浑岁岁遣使朝贡。贞观三年,党项酋长细封步赖率众内附,其后诸姓酋长相率部落归唐。太宗在其地置岷、奉、巖、远四州,以诸酋长为刺史。对其中唯一拒不附唐的拓跋赤辞亦一直坚持羁縻之策,数次派人招抚,赐姓李氏,“自此职责不绝”(卷198《西戎·党项传》<sup>[2]4112</sup>)。

吐蕃与唐关系则较为复杂,处于反复的和战之中。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至玄宗天宝十四年的一百二十多年间,吐蕃与唐朝的关系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从贞观八年至高宗永徽元年(650),为两国之间和战时期;第二时期从永徽二年至武后长安二年(702),为两国交恶和吐蕃内讧时期;第三时期从中宗景龙元年(707)至玄宗开元十年(722)以金城公主下嫁和吐蕃攻勃律国为标志,为再次羁縻交战期;第四时期从开元十一年至天宝十四年(749),以安史之乱为标志。乱前哥舒翰收复河西九曲,对吐蕃征战节节胜利;安史乱起,唐室无力外顾,西域之霸权遂为吐蕃取代。后两个时期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现专论发生在初唐时期的前两次。太宗贞观八年,吐蕃王弃宗弄赞(松赞干布)遣使入唐,是为吐蕃与唐交往之开始。太宗亦派冯德遐前往抚慰。弃宗弄赞闻突

厥、吐谷浑皆尚唐公主,于是派大论(大宰相)禄赞东随冯德遐入朝,多赍金帛,向唐室求婚。太宗因吐蕃此时数犯边境,未允其请。弃宗弄赞以为是吐谷浑从中挑拨,于是发兵攻吐谷浑,吐谷浑不支,逃往青海湖北,人畜多为吐蕃所得。继而吐蕃又破党项、白兰羌,拥兵二十万,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一带)。贞观十二年,太宗命侯君集为当弥道大总管率步骑五万拒之。九月败吐蕃于松州城下,斩首千级。弃宗弄赞退兵,遣使谢罪并再次求婚。唐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后改用羁縻方略,答应将文成公主下嫁。贞观十四年(640),弃宗弄赞遣大论禄赞东往唐纳聘礼。贞观十五年正月,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执节送文成公主进藏。弃宗弄赞大悦,见李道宗,尽子婿礼。自此至高宗咸亨元年(670),唐与吐蕃再起战端,吐蕃与唐维持了三十多年臣属关系。一方面吐蕃受中原文化影响,国势更为文明昌盛;另一方面唐在吐蕃威胁解除后,更有余力经营西域,从而奠定了唐帝国在西域的疆土和声威。第二时期初的高宗即位初,封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永徽元年,弃宗弄赞卒,其子贡日贡赞早卒,孙器弩悉弄赞普年幼不能亲政,大权落入大论禄东赞之手。禄东赞善用兵,因此吐蕃称雄西土。高宗显庆三年(658),赞普来唐请婚兼加恐吓,唐不允。显庆五年,吐蕃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青海遂为吐蕃占据。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陷唐在西域的十八州。又与于阗共袭龟兹,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天山南路尽入吐蕃之手。此时,高宗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将兵五万讨伐吐蕃,至大非川为吐蕃所败,士卒死伤殆尽。武后时代,与吐蕃交锋则互有胜负:永昌元年(689),武后命韦待价、西安大都督阎温古进讨吐蕃。大败后安西都护府罢置。长寿元年(692),则天后以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与阿史那忠节率兵再次进讨。十月,大破吐蕃,收复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与龟兹,并驻兵三万以稳定天山南路。但四年后又来个反复: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696),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率娄师德等再次进击吐蕃。与吐蕃论(宰相)钦陵赞婆战于索罗汉山,唐军大败。王孝杰罢官。当年九月,吐蕃复遣使和亲。则天后派郭元振往察其事。此时吐蕃发生了内乱,元气大伤。从武后久视元年(700)到长安三年这四年间,唐与吐蕃虽有攻伐,但吐蕃

兵一击即溃,已非昔日面目。青海一带北方领土皆重回唐控制之下,唐西部边疆得以稍安(卷196《吐蕃传》)<sup>[2]4109</sup>。

## 二

初唐诗歌尤其是边塞诗,乃是初唐民族心理和社会风尚敏感而又集中的反映。它的走向和发展趋势,也与唐代边政紧密关联。

在初唐边政的笼络忍让期,作为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的反映,初唐的边塞诗与初唐边政的互动主流是逆向的,这在关于和亲的诗篇中集中表现出来。其中主要是对和亲政策的不满和指责、卑辞厚币下的屈辱和愤懑,更有对远嫁公主的同情和对少数民族的鄙视,以及不得已情势下以“古已有之”的自我排解和安慰。如东方虬的《昭君怨三首》之一:

汉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须薄命妾,辛苦事和亲!掩泪辞丹凤,衔悲向白龙。单于浪惊喜,无复旧时容。胡地无花草,春来不似春。自然衣带缓,非是为腰身。

作者认为在唐王朝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全盛”时代,朝廷又有那么多的“武臣”足以抵抗外患,根本用不着采取和亲的下策。宋之问《赠严侍御》也是公开反对和亲“受脤清边服,乘骢历塞尘。当闻汉雪耻,羞共虏和亲。”另外一些诗人,则从反躬自责的角度对和亲政策表示不满。例如,崔湜《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怀戎前策备,降女旧因修。箫鼓辞家怨,旌旗出塞愁。尚孩中念切,方远御慈留。顾乏谋臣用,仍劳圣主忧。”诗人认为,由于缺乏谋国之臣,才让圣主忧劳,御慈思念,公主悲伤的远嫁。

初唐诗人在批判和亲政策,抒发不得已而为之积怨时,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以汉代唐,借咏歌王昭君来抒发现实感慨。以汉代唐固然是唐代诗人的惯用手法,但未尝没有以古已有之来自我排解,如东方虬的《王昭君三首》之二“仄践冰霜域,噬为边塞人。思从漠南猎,一见汉家尘。”就是以王昭君的口吻,抒发对和亲政策的怨愤。宋之问的《王昭君》也类此:

非君惜鸾殿,非妾妒蛾眉。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嫁来胡地日,不并汉宫时。心苦无聊赖,何堪马上辞。

诗人借用王昭君出塞的典故,明明白白地指

出,外族骄盛、内部用人不当,是造成和亲的重要原因。只有对内清除“画师”一类人,对外战胜“骄虏”,才是维护国家体面。李峤《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还将弄机女,远嫁织皮人。曲怨关山月,妆消道路尘。所嗟秣李树,空对小榆春。”一方面说和亲是抚戎之需,另一方面又同情远嫁的公主,更有对少数民族的鄙视。韦元旦《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以及前面提及的东方虬三首《昭君怨》也是如此。

也有些诗作一反上述主调,对和亲作粉饰和讴歌,这主要出现在一些应制奉和诗作中,如赵彦昭的《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

圣后经纶远,谋臣计划多。受降追汉策,  
筑馆许戎和。俗化乌孙垒,春生积石河。六  
龙今出钱,双鹤愿为歌。

中宗景龙元年(707),吐蕃遣使入贡并求婚。中宗用羁縻之策,以雍王李守礼之女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联姻。她是继文成公主之后,第二个与吐蕃通婚的公主。景龙三年下嫁吐蕃时,皇帝亲赋《送金城公主适西蕃》诗(今已不存),同时命诸臣僚唱和,赵彦昭的这首诗就是“奉和”。诗中申述公主下嫁的意义,赞颂皇帝能经纶远谋、大臣多计谋,公主能顾重大局。乃至把和亲说成是吐蕃“受降”,是朝廷“许和”,自然是自我安慰和排解,但和亲能将汉族文明带到边疆,改变吐蕃风俗,使两国罢兵,春生石河,这倒是实情。武平一的《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也类此。但就在这类奉和应制诗篇中,更多的诗作还是在讴歌皇上以和亲罢兵戈的识大体、顾大局同时,重在抒发公主远嫁、骨肉分离的悲伤,透露出为求和戎、不得不尔的窘况。如郑愔《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下嫁戎庭远,和亲汉礼优。笳声出虏塞,箫曲背秦楼。贵主悲黄鹄,征人怨紫骝。皇情眷亿兆,割念俯怀柔。”刘宪《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应制》:“外馆逾河右,行营指路岐。和亲悲远嫁,忍爱泣将离。旌旆羌风引,轩车汉月随。那堪马上曲,时向管中吹。”另外,像沈佺期的“玉就歌中怨,珠辞掌上恩。西戎非我匹,明主至公存”(《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苏颋《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奏曲风嘶马,衔悲月伴人。旋知偃兵革,长是汉家亲”,徐坚《奉和送金城公主适西蕃应制》“关塞移朱帐,风尘暗锦轩。箫声去日远,万里望河源”,其基调已暗暗变成同情和感叹了。

随着唐朝政府国策的改变,由卑辞厚币、恭谦忍让转为积极备战,尤其是国力增强后与突厥的攻守态势易位,以及继之的平定吐谷浑、西突厥、党项等少数民族战争节节胜利,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参战空气和尚武精神。边塞诗的主调也开始转向乐观慷慨、积极向上,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抒发从军报国、杀敌御辱的壮志豪情。虞世南、张说、崔湜、杜审言、崔融、乔知之、沈佺期、宋之问、四杰、陈子昂、刘希夷等一大批初唐著名诗人,在边塞诗中纷纷抒发从军报国、杀敌御辱的壮志豪情,翻阅初唐四杰的诗作,每一位都有这类诗篇,如杨炯的《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  
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  
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当战火逼近长安,国家面临危亡,这激起了诗人的报国之志、从戎之心。诗的结尾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更是时代尚武风尚的体现,反映出时代精神。在《战城南》和《送刘校书从军》等诗作中,诗人也表现出类似的慷慨报国之志。

卢照邻的《刘生》更有一种“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志豪情:

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是豪杰,  
死难在横行。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但  
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

诗人赞扬的刘生,称赞他为报君王一顾之恩,横行疆场为国捐躯,未尝不是诗人的自白,至少是诗人向往的楷模。诗中迸发的昂扬之气和铿锵之声,更是初唐时代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体现。诗人在《上之回》中咏歌天子御驾亲征西河所造成的震慑“单于拜玉玺,天子按雕戈。振旅汾川曲,秋风横大歌。”《战城南》中描绘将军在长城下枕戈待旦,清晨出击鏖战的场面“雕弓夜婉转,铁骑晓参谭。应须驻白日,为待战方酣。”《结客少年场行》描叙唐军追击西突厥逃兵的豪迈气势“不受千金爵,惟论万里功。将军下天山,虏骑入云中。烽火夜似月,兵气成晓虹。”皆回荡着慷慨之气、报国之情!

骆宾王一生曾三次从军边塞,从裴行俭讨伐西突厥时曾远征至碎叶城,一生共写下十二首边塞诗。是初唐诗人中出塞最远、出塞诗最多的一位。其边塞诗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抒发自己为国

效力的慷慨之志。在《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中,他表示“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在《边城落日》中,他再一次抒发自己以身许国、报效明主的决心“壮志凌苍冥,精诚贯白虹。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在著名的长诗《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中,诗人一方面描述了军旅生活的艰难困苦,但仍以高亢的情调,显示了边防将“重义轻生”、“东征西伐”、“誓令氛浸静皋兰”的英勇战斗的精神。他在《从军行》中又写道: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  
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  
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与卢照邻《刘生》不同的是,诗人用夸饰的手法塑造了一位意气风发、武艺高强的唐军将领形象,更富有浪漫的时代气息。但共同的都是为报君王一顾之恩——“平生一顾重”,不惜为国捐躯,以死相报——“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诗人在《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中所表白的“绛节朱旗分白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也意在报效明主的知遇之恩。

王勃的《陇西行》十首是他亲赴边塞的纪实之作,其中的七、八两首也是充满克敌制胜的豪气,慷慨赴疆场的尚武精神:

烽火照临洮,榆塞马萧萧。先锋秦子弟,  
大将霍嫖姚。(之七)

开壁左贤败,夹战楼兰溃。献捷上明光,  
扬鞭歌入塞。(之八)

初唐边塞诗中流露出的这种慷慨报国之志和“视死忽如归”的壮志豪情,自然不只是四杰,在虞世南、张说、崔湜、杜审言、崔融、乔知之、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刘希夷等人的边塞诗作中也有表现。如张说的《巡边在河北作》“沙场喷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崔湜的《大漠行》“汉将纷纭攻战盈,胡寇萧条幽朔清。韩君拜节偏知远,郑吉驱旌坐见迎。火绝烟沉右西极,谷静山空左北平”;张柬之的《出塞》“警闻传羽檄,驰突救边荒……手擒郅支长,面缚谷蠡王”;刘希夷《从军行》“平生怀仗剑,慷慨即投笔……丈夫清万里,谁能扫一室”;郭元振的《塞上》“塞外虏尘飞,频年出武威。死生随玉剑,辛苦向金微”;李峤《饯薛大夫护边》“伫见燕然上,抽毫颂武功”;崔融《从军行》“坐看战壁

为平土,近待军营作破羌”;源乾曜《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奉国知命轻,忘家以身许”;郑愔《塞外三首》“丈夫期报主,万里独辞家”;裴璀《奉和御制旋师喜捷》“斩虏还遮塞,绥降更筑城。从来攻必克,天策振奇兵”;员半千《陇头水》“将军献凯入,万里绝河源”。陈子昂在《送魏大从军》要友人“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在《东征答朝臣相送》一诗中,更是直抒自己以身许国、旌节从戎、授绳系虏的壮志抱负“平生白云意,疲沓愧为雄。君王谬殊宠,旌节此从戎。授绳当系虏,单马岂邀功。孤剑将何托,长谣塞上风。”

这种投笔从戎,誓在扫清四海的壮志和行为,正是初唐时代边政主调改变后积极备战、抗击外辱的民族精神的释放,也是唐王朝在与突厥、吐谷浑、西突厥、党项等少数民族战争节节胜利,民族自信心空前增强的再现,皆形象地勾画出初唐时代那种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

第二,无可讳言,这批初唐诗人急于事功、热心从军的目的,也包含有博取功名、立功封侯、光宗耀祖的个人动机和家族的荣誉感。这在初唐边塞诗中表露得极其充分,也毫不避讳,因为在封建士大夫眼中,这与他们以身许国、报效明主并不矛盾,完全是一致的。上面提到的杨炯《从军行》,之所以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慷慨豪情,“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的报国之志固然是一个原因,博取功名、立功封侯可能是更重要的内在因素。诗人并不避讳这一点,他曾公开表白“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出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紫骝马》)。骆宾王在《宿温城望军营》中,一方面“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同时也是“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在《从军中行路难二首》中又再一次重申“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

初唐边塞诗中这类追求功名、博取封侯的表白,不仅是四杰,从朝廷元老到后辈小生亦皆如此。前面提到的燕国公张说,一方面表白“誓欲成名报国,羞将开国论勋”,“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同时也勉励一位领军出塞的将军“待闻出塞还,丹青上麟阁”(《乐园宴武格沙将军赋得洛字》);祝愿出使吐蕃的郭元振“知君万里侯,立功在异域”(《送郭大夫元振再使吐蕃》)。与张说并称“燕许大手笔”的许国公苏颋也对赴朔方军的钱大夫作出同样的期许“拔剑行人舞,挥戈战马驰。



明年麟阁上,充国画于斯。”另一位元老虞世南在《拟饮马长城窟》中也曾发出这样的叹息“拓地勋未赏,亡城律岂宽?”沈佺期的《塞北二首》追求的是“二庭无岁月,百战有勋”、“归来拜天子,凯乐助南薰”;其余者如窦威的《出塞曲》“会勒燕然石,方传车骑名”;孔绍安的《结寄少年场行》“若使三边定,当封万户侯”;崔湜《塞垣行》“岂要黄河誓,须勒燕然石”等也都流露出这类封侯之愿和功名之念。

第三,通过塞漠风光和边地艰苦征战生活的描述,来展露英风豪气和进取精神。初唐的边塞诗人大多去过边塞,有的甚至参加过征战,因此,异域风光的奇特,征战生活的艰苦都给诗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极其真实的在诗作中表现了出来。同中晚唐以及其它朝代的边塞诗不同的是,诗人描述边地环境的恶劣和征战的艰苦,但情感上并不伤感凄苦,而着眼于“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从中展露的是唐人的尚武精神。唐太宗《饮马长城窟行》中,如实地描绘了朔风悲号,雪满阴山,层峦叠嶂,烽台危峙等塞外异域战地风光,从中流露出征战的艰苦和战斗的酷烈,但其目的是意在烘托这位英主“清胡尘”、“氛雾静”,勒石凯旋,天下归宁的宏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初唐元老中这类诗作还不少,如虞世南的“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飞雪……马冻重关冷,轮摧九折危”(《从军行》之一);“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沙磴离旌断,晴川候马归”(《从军行》之二);“凛凛边风急,萧萧征马烦。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雾锋黯无色,霜旗冻不翻。耿介倚长剑,日落风尘昏”(《出塞》)。杨师道《陇头水》“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雾中寒雁至,沙上转蓬轻”。许敬宗《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玄塞隔阴戎,朱光分昧谷。地游穷北际,云崖尽西陆”等。在这些以身许国的边塞诗中,正是通过边地险阻、征战辛劳和战斗酷烈的如实描绘,反衬出这批太宗的股肱之臣,追随太宗“执契静三边”,平定天下的壮志,并在南征北讨之中,最后出将入相,实现了自己的封侯之愿。

骆宾王一生曾三次从军边塞,到过甘肃、青海、新疆、昆明、山西等地,写下12首边塞诗,是初唐诗人中出塞诗写得最多的一位。他曾从裴行俭讨伐西突厥时曾远征至碎叶城,也是初唐诗人中出塞最远的一位。在这位名诗人诗篇中,塞漠的

战地风光得到出色的描绘,男儿气概、英雄本色从中得到尽情流露:高宗咸亨元年(670)时任东台详正学士的骆宾王以事获罪,被罢职。当年夏,上诗吏部侍郎裴行俭,请求从军自效,随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征吐蕃。八月,薛仁贵部在大非川为吐蕃所败,士卒死伤殆尽。骆宾王所在部队奉命更往西北戍守庭州蒲类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一带,诗人到达后写了首《夕次蒲类津》,描述这里的异域风光和此时的心情: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龙庭但苦战,燕颌会封侯。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蒲类海又叫婆悉海,今称巴尔库勒海。诗中描述了异域的军旅生活,抒发了对家乡的思念,但也有个愿望在支撑着他“龙庭但苦战,燕颌会封侯”。诗中看不到戴罪立功、从军异域的沮丧和伤感,而是有着封侯愿望的支撑,还有着为国雪耻的壮志豪情。咸亨三年,骆宾王又从西北边陲移防西南的姚州(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前线。当时,“姚州蛮叛”,上命右卫副率梁积寿募兵五千三百人去平叛,骆宾王随行,途中写下这首《军中行路难》:

杳杳丘陵出,苍苍林薄远。途危紫盖峰,路涩青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绝壁千里险,连山四望高。中外分区宇,夷夏殊风土。交趾枕南荒,昆弥临北户。川原绕毒雾,溪谷多淫雨。行潦四时流,崩查千岁古。漂梗飞蓬不自安,扞藤引葛度危峦。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

这是初唐唯一的一首描绘西南边陲哀牢山一带地形、气候和景色的诗篇,在民族交往史、历史地理、气候史等方面,都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诗中描述哀牢山一带高峻的山岭,泞涩的道路,千里绝壁、淫雨连绵,再加上缭绕的毒雾,这就是诗人对交趾南荒的感受。但是南征的将士却不畏艰险“漂梗飞蓬不自安,扞藤引葛度危峦”,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诗的结尾,诗人道出这种精神状态的源头“绛节朱旗分白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无论是上首《夕次蒲类津》,还是这首《军中行路难》,其精神状态,都丝毫看不出这是诗人获罪后从军自效的



无奈,也看不出是在大非川为吐蕃所败几乎全军覆没之后的沮丧。在初唐边塞诗中,描绘塞漠的战地风光的诗篇还有卢照邻的《梅花落》“梅岭花初发,天山雪未开”,《结客少年行》“龙族昏朔雾,鸟阵卷寒风。追奔瀚海咽,战罢阴山空”,《雨雪曲》“雪似胡沙暗,冰如汉月明。高阙银为阙,长城玉作城”,《紫骝马》“塞门风稍急,长城水正寒。雪暗鸣珂重,山长喷玉难。不辞横绝漠,流血几时干”;杨炯《从军行》“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战城南》“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鸟翼,甲冑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王勃《陇上行》“负羽到边州,鸣笳度陇头。云黄知塞近,草白见边秋”;沈佺期《塞北二首》“海气如秋雨,边峰似夏云”,“冰壮飞狐冷,霜浓候雁哀。将军朝授钺,战士夜衔枚。紫塞金河里,葱山铁勒隈。莲花秋剑发,桂叶晓旗开”;袁朗《赋饮马长城窟》“日落塞风起,惊蓬被原隰。零落叶已寒,潭流清且急”;崔湜《大漠行》“云沙泱莽天光闭,河塞阴沉海色凝”,“火绝烟沉右西极,谷静山空左北平”;宋之问《塞北二首》“将军朝受钺,战士夜行枚”,《送卢管记仙客北伐》“雁行度函谷,马首向金微”等,也都是通过塞漠风光和边地艰苦征战生活的描述,来展露英风豪气和进取精神。

### 三

既然是战争,当然是残酷的;对功名的追逐,可能封侯更有可能梦断;只要面对现实又善于思考,自然会发现初唐边政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初唐边塞诗在前行的过程中也发生某种衍变:有部分诗章,倾诉着诗人壮志未遂、封侯梦断以及久戍不归勾惹起的伤感和对故园的思念;真实记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征夫思妇的无穷哀怨;对朝廷边政和将帅的无能的指责和批判,这既是对南朝以来边塞诗传统的继承,也是向盛、中、晚唐边塞诗的流变。

第一,初唐边塞诗中的部分诗章,倾诉着诗人壮志未遂、封侯梦断的郁闷,久戍不归勾惹起的伤感和思念

骆宾王在西北婆悉海一带久戍时写过一首《久戍边城有怀京邑》,诗人的伤感和思乡之情,表面上似乎是“行役风霜久,乡园梦想孤”而引发,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却在下面所说的“有志惭雕朽,无

庸类散樗。关山暂超忽。结网空知羨,图荣岂自诬”。说自己是“散樗”、“雕朽”,所以有志难遂,这是自谦也是言不由衷之词。无端被谗的悲愤、壮志成空的哀叹方是题旨。诗人还有首《在军中赠先还知己》,抒发了同样的苦闷和悲愤“转蓬俱行役,瓜时独未还。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如果说前面两首还是在暗喻的话,下面这首《边夜有怀》中则直接道破自己倚伏难定、荣枯难通的尴尬处境,以及待罪从军却壮志难遂的愤懑之情:

汉地行逾远,燕山去不穷。城荒犹筑怨,碣毁尚铭功。古戍烟尘满,边庭人事空。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旅魂劳泛梗,离恨断征蓬。苏武封犹薄,崔骃宦不工。惟馀北叟意,欲寄南飞鸿。

骆宾王的这种苦闷在初唐诗人的边塞诗中不断重复着,如崔融《关山月》:

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

诗人将异域风光的描绘与思乡之情的抒发结合起来。征人飞渡关山,本来是“气逐边风壮”,但遥遥无期的戍守,“夜夜闻悲笳”,也不由得勾起思乡之情了。与其相类的还有卢照邻《关山月》“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沈佺期《关山月》“将军听晓角,战马欲南归”等,均抒发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

陈子昂多次投笔从戎,亲临边塞,出谋划策,试图杀敌立功,以身许国,结果反遭忌恨,遭到贬谪。理想的破灭,使他悲愤难平,写下了组诗《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和名篇《登幽州台歌》。前者通过凭吊古迹、缅怀前贤,以抒发怀才不遇、壮志不酬的感慨。如在第六首《郭隗》中说“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言下之意,燕国有才士,唐代也有才士,只是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而已。第二首《燕昭王》以追慕礼贤下士的燕昭王来借古讽今,暗中指斥武周集团不知道爱惜和使用人才。在《登幽州台歌》中,他更是抚今思昔、仰天长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理想幻灭的壮士之悲。

第二,真实记述了战争带来的苦难,征夫思妇的无穷哀怨

兵者,凶器,无论是外族的入侵还是正义的反

击,它所造成的流血牺牲,戍卒的有家难归和思妇的断肠思念则是相同的。初唐的一些诗人,尽管他们支持朝廷用兵,充满以身许国的尚武精神和豪气,但是他们现实主义的笔触并没有无视战争造成的种种灾难。

首先是战争造成满目疮痍、山川萧条,给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如诗人李峤一方面鼓励友人以身许国、立功燕然“伫见燕然上,抽毫颂武功”(《饯薛大夫护边》),但在咏歌征战的《汾阴行》的结尾,也如实地写出战争造成惨状以及诗人的感受:

英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从高祖武德七年至九年,突厥大规模侵边每年一次。九年七月,甚至攻至渭水北岸之便桥,逼近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冒险亲到渭水,与颉利订城下之盟,多输金帛,才化解危机。孙逖在《丹阳行》中描述的“京都乱如燬。双阙戎虏间,千门战场里”,“荆榛古木闭荒阡,共道繁华不复全”,应当是突厥入侵中原、杀戮毁坏的真实记录。

陈子昂《感遇》其三描述诗人站在苍苍的丁零塞上,面对摧兀的亭堠,今古的荒途,回忆起“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的惨状,将士“暴骨无全躯”的下场,发出深深的叹息: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黄沙幕南起,白日隐西隅。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这首诗作于垂拱二年的北征途中。亲身经历的边塞生活,使他深刻了解了边患的严重性和士卒、人民的悲惨命运。诗中通过描绘边塞的荒凉景象,对成千上万战死沙场的士卒,对饱受战火、家破人亡的边地人民,寄予了满腔同情。诗的结尾“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已不只是同情,而是对统治者一味征战、不恤士卒发出质问了。

初唐诗人的边塞诗作还通过征夫思妇的无穷哀怨来表现战争带来的苦难,如沈佺期《杂诗三首》之三: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可怜闺里月,常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谁

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诗中以一位少妇的口吻,写她对久戍不归丈夫的思念。诗的开头就道出亲人久戍不归的原因:黄龙戍,频年不解兵。为何对犯边的胡人束手无策,年年备胡而边患难靖?这就足以引起人们的思索。诗的结尾则道破其中的原因“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是因为缺少李广这样的龙城飞将,才使边患难靖,代代依然。沈佺期还有首《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也是写一位少妇对征戍辽阳十年不归而且音书断绝的丈夫的思念“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只是诗意仅停留在思念这个层面上,未能像《杂诗三首》之三这样引发读者深度思索。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每一位初唐诗人的边塞诗篇中都有这类题材,表现了初唐诗人在极力表现抗战主潮和尚武精神的同时,并未忘记民生关怀和现实精神,如李峤《倡妇行》:“十年倡家妇,三秋边地人。红妆楼上歇,白发陇头新。夜夜风霜苦,年年征戍频”;杨炯《折杨柳》:“边地遥无极,征人去不还。秋容凋翠羽,别泪损红颜。望断流星驿,心驰明月关。藁砧何处在,杨柳自堪攀”;张紘《闺怨》:“征客近来音信断,不知何处寄寒衣”;沈如筠《闺怨二首》:“陇底嗟长别,流襟一动君。何言幽咽所,更作生死分”;崔珣《孤寝怨》:“暗灯愁独坐,床空怨独眠”;张若虚《代答闺梦还》:“梦魂何处入,寂寂掩重扉”;崔湜《折杨柳》:“那堪音信断,流涕望阳关”;崔液《代春闺》:“妾恨十年常独守,君情万里在渔阳”;徐彦伯《闺怨》:“征客戍金微,愁闺独掩扉。尘埃生半榻,花絮落残机。褪暖蚕初卧,巢昏燕欲归。春风日向尽,衔涕作征衣”;许景先《折柳篇》:“自怜柳塞淹戎幕,银烛长啼愁梦著。芳树朝催玉管新,春风夜染罗衣薄”等等,都是通过征夫思妇的无穷哀怨来表现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但是,只要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表现征夫思妇无穷哀怨的边塞诗重在表现双方的热切相思,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对战争造成的苦难真实反映,但很少有怨天尤人,对朝廷边政的诅咒和批判,也很少有颓废绝望的成分。尚武事功、为国戍边、从军封侯仍是其主流话语。几乎没有盛唐边塞诗“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杜甫《后出塞》)那样对朝廷边政的尖锐批判;像中唐边塞诗“从此甘贫坐,休言更到边”(林宽《塞上还答友人》)对从军

封侯的绝望;像晚唐边塞诗“劝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岁》)那种对征战的彻底否定,这也是它与后来盛、中、晚唐边塞诗同一题材下的不同之处。

### 第三,对朝廷边政和将帅无能的指责和批判

初唐边政总的来说是成功的,赢来疆域的扩大和四十多年边境的基本安宁。但是其边政也并非无可指责之处。饶宗颐在《略论李唐西北边政之得失》一文中认为初唐边政是有得有失“唐人治边徼,其得在于善用人,而失则在自戕其人。”文章举西北边帅王方翼、郭元振的遭遇为例:一代名臣裴行俭曾推荐王方翼为安西都护。王大破三姓咽面。在热海苦战时,流矢贯臂,高宗视其伤叹息。但因王方翼是高宗废后的亲戚,因而得不到信用改任夏州都督。武后光宅元年(684)终因程务挺牵连下狱,最后流放到崖州而死。郭元振为一代名将,深谙边政兵略,又屡建大功。玄宗时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极人臣。开元元年(713)冬,讲武于骊山,征兵二十万,因所谓军容不整,将斩之。在张说劝谏下乃流放新州,终弃不用。这些史实,当然被关注边塞的诗人们所目击并引发深深的思考。例如长期统兵抗击吐蕃的郭元振,在《塞上》一诗中就以边镇的长期被围和虏骑的猖獗等亲身经历来批判边政,指责将帅的无能:

塞外虏尘飞,频年出武威。死生随玉剑,辛苦向金微。久戍人将老,长征马不肥。仍闻酒泉郡,已合数重围。

由于胡骑的不断入侵,唐军将士不断在武威一带出击。连年的征战,连马都“不肥”,战士的辛苦可想而知,更不要说生死未卜了。但是常年的辛苦甚至生命的代价换来了什么呢?结果是“仍闻酒泉郡,已合数重围”,合围未解,胡乱难平。这是谁的责任呢?诗人虽未直接回答,其中对边政的批判,对将帅无能的指责是可以想见的。另一位元老重臣虞世南的《从军二首》(之一)则重在揭露边塞征战中将士的赏罚不均、功业难成等弊端:

结发军驱驰,辛苦事旌麾。马冻重关冷,轮摧九折危。独有西山将,年年属数奇。

从年轻时就参加保卫边塞的征战,一生出生入死、历尽艰难,但白首未封侯。这位西山将军自我解嘲说,可能像李广一样“数奇”命不好吧。但

就像李广未能封侯并不是“数奇”,而是朝廷赏罚不公一样,这位西山将同样是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另一位朝廷重臣乔知之在《苦寒行》中不仅对“朔马饮寒冰,行子履胡霜”的行役戍卒表示深切的同情,更对“卧死黄沙场”的战死将士得不到抚恤表示愤慨,对“由来从军行,赏存不赏亡”的不公正现象直接进行抨击。

至于从军边塞欲以此来博取功名的“书生”,对此更有切身感慨,如王宏在《从军行》中借一位从军边塞、舍身为国的英俊少年所遭遇的不公正,来控诉朝廷的赏罚不公以及舍身为国壮志的不被理解:

儿生三日掌上珠,燕颌猿肱秬李肤。十五学剑北击胡,羌歌燕筑送城隅。城隅路接伊川驿,河阳渡头邯郸陌。可怜少年把手时,黄鸟双飞梨花白。秦王筑城三千里,西至临洮东辽水。山边垒垒黑云飞,河畔苗苗青草死。从来战斗不求勋,杀身为君君不闻。凤凰楼上吹急管,落日徘徊肠先断。

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的英俊少年,十五岁就告别父母,奔赴疆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追求个人建功立业,享受荣华,而是舍身为国,舍身为君,结果却是君王不闻,英名湮没。这首诗一针见血,点明了赏罚不明的根本原因,直抒胸臆,泼辣大胆。

陈子昂在《感遇》(三十七)中指出,之所以造成胡虏猖狂,连年寇边,“藉藉天骄子,猖狂已复来”的原因就在于“塞垣无名将”。守边将帅的无能,屡战屡败,“亭堠空崔嵬”,使得边民被杀被虏,诗人感慨万分“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在《感遇》(三十四)中他一方面借一位结发从军幽燕少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来批判朝廷的赏罚不公;另一方面通过这位游侠少年的愤慨“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把边氛难靖、战乱不已的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朝廷边政。《感遇》第二十九首的批判矛头更加显豁: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威粮匝邓道,荷戟争羌城。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昏曠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拳局竞万仞,崩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诗中把中原处于“羽檄复相惊”的战乱之中,

把战士们“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征途上的艰难险危皆归结为庙堂谋算的失策——“肉食谋何失”,把批判的矛头明确地指向肉食者。还不止于此,诗人还感叹“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现在泰阶不平,战乱不已,言下之意,现在的皇上不是圣人。这在“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封建社会道德规范中,是具有相当叛逆性的。在《答韩使同在边》中又一次作出这样的批判“汉家失中策,胡马屡南驱”。在《题祀山烽树赠乔十二侍御》又作出同样的指责“汉庭荣巧宦,云阁薄边功”。总之,在陈子昂看来,胡虏虽猖狂,但不足畏;令人担心也是最令人愤慨的是庙堂失算、赏罚不公,有志报国者却壮志难遂、空老边关。可是,他对此却无可奈何,只能是“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只能“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除陈子昂以上诸作外,感叹时弊的边塞诗还有不少,如卢照邻的“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咏史四首》第四),沈佺期的“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杂诗》第三)等。王勃《陇西行》十首中的第九:“更欲奏屯田,不必勒燕然。古人薄军旅,千载谨

边关”,谨守边关,不必穷追不舍,捣敌巢穴,也就是后来杜甫在《后出塞》中所说的“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之意。

由此可见,到了武后时代,初唐边塞诗中那种乐观、开朗,充满建功立业、显亲扬名、崇尚武功的时代精神已经渐行渐远了。

### 【参考文献】

- [1] 魏征. 隋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 刘昫. 旧唐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0.
- [4]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5] 令狐德棻,等. 周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6] 岑仲勉. 隋唐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7] 王溥. 唐会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8] 范祖禹. 唐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9] 杜佑. 通典[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5.

【责任编辑: 赵荣蔚】

## Frontier Politics and Evolution of Frontier Poem's Main Theme in Early Tang Dynasty

CHEN You – bing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Anhui 23000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arly Tang Frontier politics' adjustment and change from surrender, fight, battle to reconciliation dealing with Turkic, Tibetan, Tuyuhun and other ethnical political powers, and discloses the general concept of the frontier politics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ecific initiativ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paper, on the basis of above analysis, explores the link between Early Tang frontier poem and its Frontier politics, and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rontier poem.

**Key words:** Early Tang Dynasty; Frontier politics; Frontier poem